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 联合起来

——比利时共产党布魯塞尔地区委员会文件

世界知識出版社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 联合起来

——比利时共产党布魯塞尔地区委员会文件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4年·北京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合起来

——比利时共产党布魯塞尔地区委员会文件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圓恩寺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0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三) 0.50元

开本 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張4·字数 87,000

1964年2月第一版 1964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統一书号 3003·705

目 录

爭取党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团結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馬克思列宁主义团結	雅克·格里巴 1
(1962年1月)	
比利时共产党布魯塞尔地区委员会执行局关于古巴 局势的決議	45
(1962年11月6日)	
比利时共产党布魯塞尔地区委员会执行局关于中印 边界問題的決議	46
(1962年11月6日)	
比利时共产党布魯塞尔地区特別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	47
(1963年6月21日)	
比利时共产党布魯塞尔地区特別代表大会总決議	61
(1963年6月23日)	
比利时共产党布魯塞尔地区委员会领导机构名单	73
(1963年6月)	
比利时共产党布魯塞尔地区委员会关于部分禁止 核試驗条約的決議	76
(1963年8月9日)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合起来!	81
——比利时共产党布魯塞尔地区委员会关于答复苏共中央 1963年7月14日公开信的決議	
(1963年8月15日)	
比利时共产党布魯塞尔地区委员会执行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十四周年时致中共中央的賀电	118
(1963年10月1日)	

爭取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團結和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團結

雅克·格里巴

我黨中央委員會已決定就黨的政治生活及當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觀點交鋒，在黨內展開廣泛的討論。

在此名義下，黨員們都被提請參加《紅旗報》所开辟的《論壇》的討論。

這樣一種研究是勢在必行的。

為確保各國工人黨的勝利，以至整個工人運動的勝利，樹立正確思想立場始終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從馬克思到今天，在思想戰綫上一直繼續着往往是激烈的鬥爭。

實踐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他們一貫輕視或低估思想鬥爭，過去和現在都只能把工人運動導向失敗。

在歷史上，曾出現過某些嚴重的時刻。我們現在正處在這樣的時刻之一。

《紅旗報》目前大量報道各國共產黨間的意見分歧。

但是，在我們黨內這些分歧也同樣存在着，包括對我黨的政治路綫的內容的估價在內。事實上，黨內的意見分歧在日益嚴重化。列寧在《共產主義幼稚病》一書中說：“一個政黨對自己的錯誤所抱的態度，就是衡量這個黨是否嚴肅認真，是否真正履行

它对自己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一个严肃认真的政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就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教育和训练群众。”①

在我们的党报上不断出现歪曲党历届代表大会决议的和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回答也同样应该是公开的。我们每个人以及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都应该担当起自己的责任。

权利要求的斗争

分歧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举出党在权利要求问题上的行动。

有某些观点在布鲁姆同志于《红旗报》1961年11月27日题为《年终总结》的文章中得到最明显和最完整的表达。文章通篇皆可引证，我们只举两个关键部分：

“显然，我们所关心的任何的紧迫问题只有通过心平气和的谈判才能得到适当的解决”。……

“这些问题都是过于复杂，以至劳资双方光是冲突则无法解决。而且，只有反动派才希望发生冲突。”

这是把某种和平共处（后面我还要谈到）的观点搬来解决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对抗阶级之间的矛盾问题上了。

事实上，这样的一种谈判，是同工人阶级的斗争相对立的；或者是同能够促成斗争的准备的压力相对立的。而这样一

①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9页。——译者

种談判却被看成是一种高級的行动方式！

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應該制訂正确的行动目标，帮助工人运动最大限度地發揮战斗的团結。一个共产党人應該向劳动人民說：“我們愈团結，我們的战斗力就愈大，我們百折不撓的精神就愈能得到充分地發揮，我們就愈能以最小的代价取得巨大的胜利”。而有人竟把談判說成是行动的終結，甚至說成无須全面展开行动就可以实现談判。

因为这两种观点是針鋒相对的，在日常斗争的具体問題上經常出現意見分歧，就是不足为奇的了。

——布魯塞尔的同志們都知道，在百万人大罢工的过程中，地区委员会领导和政治局委員之間在如何領導罢工的問題上发生了分歧。

——对于党所建議的召开全国劳工會議的目标的确切意义，也出現了同样范围的意見分歧。絕大多数党员认为，这是一个行动目标，它在一个特定的阶段可以促进参加斗争的各行业間的团結。另一些人則认为，全国劳工會議就是“解决方法”。一个同志甚至說这就是“民主解决”工人問題的“唯一方法”。

——同样，坚持要把在 1961 年 11 月底以后召开全国劳工會議当作唯一目标的問題，也出現了意見分歧，也就是說，劳动人民，特別是公用事业要求爭取当前的权利，尤其是在工資待遇的行动意志明显表达出来的时候。

——对于把組織 1961 年 12 月 20 日行动日当做今后斗争的动员性因素会有多少重要意义，也出現有分歧。

单一法和剛果問題

让·布魯姆在 1960 年 10 月 10 日（約在大罢工前两月）发

表在《紅旗報》上的一篇文章中說：

“伊斯更斯集團是強大的，這是由於反對派內部的混亂，如果反對派能團結起來就是勢不可擋的。……那麼這種混亂究竟從何而來呢？……我們想，這一混亂的主要原因在於剛果的悲劇，或更確切地說，在於反动派圍繞剛果事件掀起的冷戰氣氛。……在剛果的比利時人的安全和活動是當前一個關鍵問題。”

我在致政治局的一份批判這篇文章的文件中曾指出：

“難道我們真的把在剛果的比利時人——所有的比利時人——的安全和行動看作當時的關鍵問題嗎？其中包括在剛果的比利時老爺們，那些摧毀自然財富的莊園主實行種族隔離、每日僅付剛果人十一法郎工資的殖民主以及獲取44%純利（如1959年的礦業聯盟）的托拉斯的資本家？

“難道反對緊縮政策的鬥爭，真的是從屬於這一關鍵問題——造成反對派的混亂而使伊斯更斯政府強大的‘主要原因’——的‘解決’嗎？

“馬克思列寧主義所揭示的真相是甚麼呢？

“壟斷組織及其政府奉行一種為壟斷組織追求最大利潤和超額利潤的政策。這種政策除去其他特征之外，還以北大西洋公約（壟斷組織的神聖同盟）、歐洲煤鋼聯營以及共同市場的要求、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存在、比利時經濟的相對薄弱、以及壟斷組織在剛果行動的某些失敗的後果為特征。

“比利時政府要繼續奉行維持自己的利潤的政策。為此，企圖將這筆由於這一政策而日益增加的開支轉嫁到勞動人民身上。

“事實上，我們早已說過，緊縮計劃並不是什麼新的東西。壟斷組織及其政府現在竟甘冒風險來進行實力的較量。為什麼在

現在呢？因為，如果它們要想繼續奉行自己的政策，它們沒有別的办法。因此，這一分析的依據是確信我國資產階級的軟弱，而不是它的強大。同樣，也確信：贏得反對緊縮政策鬥爭的勝利，也就是贏得了一場十分重要的政治鬥爭，就是創造了使政局發生重大變化的條件。但同時也要估計到由於這場戰鬥所冒的風險因而將是很艱苦的。

“當然，壟斷組織及其政府所以敢於鋌而走險，是因為他們認為，力量對比對他們還相當有利；工人階級的分裂，比利時工人運動內部修正主義的影響，都被考慮在內。我們可以在這裡證實資產階級某些慣常現象的存在——它們對自己力量總是估計過高，而機會主義在決定性時刻，情況一樣，也高估資產階級的力量。

“不言而喻，資產階級正千方百計地企圖欺騙勞動人民，它也曾企圖在這方面利用剛果事件。他們得逞了嗎？或更確切地說，這些事件是否具有左右勞動人民思想的決定性作用，以至由此產生的‘混亂’構成了力量對比**有利於**（？）伊斯更斯的主要因素呢？並非如此。事實上，沙文主義運動已經遭到失敗，只有完全脫離現實才會把這當作反緊縮鬥爭困難的主要因素。”

剛 果 事 件

現在來談談在嚴重的剛果事件中黨所採取的立場。這個事件深刻地震撼了比利時資本主義，它像一切巨大的緊張性事件一樣，對於每一個革命政黨及其黨員的堅定性都是一個考驗。

不幸的是，要舉出黨所表現的猶豫態度和所犯的缺點和錯誤的例子那就太多了。下面就是幾個例子：

——1960年7月11日在《紅旗報》上發表的政治局決議；

——在同一天所印发的一份傳单，这份傳单是，正当比利时政府发动侵略性軍事行动——这一行动在前一天遭到卢蒙巴政府的强烈譴責——的时候印发的，其中几句关键性的句子是：

“所以，保证比利时剛果之間的和平关系的最好方法，就是要准备在一旦恢复平靜之后，从剛果撤回全部比利时軍隊。”

一旦恢复平靜！竟对武装干涉毫无譴責！把实际正在进行的侵略和比利时部队正在剛果进行对剛果人民和卢蒙巴政府的干涉同恢复平靜說成是可以調和的。

剛果与联合国

1960年7月13日的政治局決議开辟了这样一个时期：把联合国的干涉毫不加批判地說成是基本上具有积极意义的，而拋棄了階級斗争和反帝斗争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准則。可以回忆一下決議所說的話：

“在取得剛果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建立一支国际警察部队，它将使比利时軍隊立即撤退并迅速消除在剛果的一切外国軍事基地。”

而此时的根本問題，是立即地和无条件地撤走比利时軍隊，这是卢蒙巴政府当时所要求的，甚至以后的联合国的決議——虽然沒有——也要求这样做。

还在1960年10月13日《紅旗报》上，让·布魯姆在题为《比利时与剛果利益相同》(!)一文中使用了如下詞句：

“我們党从7月悲剧一开始，就曾建議向联合国发出呼吁。这不是一个完善无缺的解决办法，因为联合国不是一个完善无缺的机构，它是各种对峙傾向在政治上进行决斗的場所。

“然而，联合国阻止了比利时殖民主义和可能的帮凶进行他

們所准备的大規模的打击……此外，在人們进行討論的时候，沒有进行战争。这已經是一个宝贵的成果。”

当时，我在致政治局的同一文件中，提出了如下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是无須收回的，它已为后来的悲惨事件所证实：

“卢蒙巴政府曾向联合国发出呼吁，爭取这一組織帮助他抵抗比利时的侵略和把比利时军队从剛果驅逐出去。但是帝国主义企图歪曲这一呼吁的实质，利用联合国机器扼杀年青的剛果共和国。應該勇于承认，即使是由于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或是由于剛果人民、社会主义国家和某些非洲国家所采取的行动，而在某种程度上抵擋了比利时殖民主义本身的行动，但是帝国主义的这种阴谋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成功。

“我們應該清楚地看到，我們当前对联合国进行斗争的意义。我們不应把我們所希望的那种联合国、把我們要求它不再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的这种行动和建議同現在的联合国，特别是它的首脑机构今天是帝国主义工具的情况混为一談。

“如果我們希望我們对联合国的态度是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政党所应采取的态度，假若我們不希望这种态度会被国际反动派所利用，我們就應該責无旁貸地无情地揭露联合国或帝国主义和它用来进行压迫的联合国机器的一切行动。我們應該揭露帝国主义的种种阴谋，特别是在联合国的外衣下，通过武力来实现的阴谋。

“如果我們希望我們对联合国的态度具有真正的进步价值，希望各国人民的行动能改变它的性质，那么就只有这样。

“在剛果事件上，怎么能只把对联合国的批評局限在指出它不是一个完善的机构？殖民主义和反革命的恐怖正籠罩在利奥波德維尔、下剛果、加丹加和卡賽，数百名剛果爱国者正在帝国主义代理人的暴力下牺牲，这时候，怎么能說在討論的过程中，

沒有發生戰爭，這已經是一個寶貴的成果呢。人們怎能在 1960 年 10 月 13 日絕口不談，在聯合國的掩護下，剛果議會已處於無法行使職權的地步，三次獲得議會信任的合法政府不僅無法行使領導權力而且已實際被打入非法地位，相反，卡薩武布、朋博可、伊里奧、蒙博托和沖伯、卡隆吉卻保持和鞏固了自己的地位。”

加 丹 加 問 題

前面所採取的這些立場——我剛剛已批判過——同 1961 年 12 月 12 日共產黨議會黨團就加丹加提出的決議提案所犯的令人遺憾的嚴重的政治錯誤有着明顯的聯繫（在最近這一次中央委員會上政治局也已對這項提案提出批評）。我們回想一下，這個提案要求比利時政府立即採取措施在加丹加停火和成立一個調停委員會。但是，這時的局勢已經非常清楚。

在加丹加的聯合國軍，已在執行聯合國規定從剛果清除外國雇佣軍的決議的幌子下採取行動。美帝國主義巧妙地衡量了它可從中利用的東西。美帝國主義只是為了下述目的才支持聯合國軍的軍事行動：通過武力來逐步消除不符合它的看法的某些殖民主義集團的政策。的確，從那時起，美帝國主義是為了阻止聯合國的行動而行事的，以便挽救沖伯及其集團，實現利奧波德維爾和伊利沙伯維爾的新殖民主義代理人之間的和解，然後走向消滅受害的剛果的反殖民主義和進步的民族力量的階段。

我們黨議會黨團所提出的這個令人遺憾的提案，由於缺乏遠見，與美國正在進行中的陰謀相吻合。

在起草這個提案的時候，正是基贊加已遭逮捕和陰謀使沖伯進入“剛果中央政府”的時候。

和平共处

对所犯錯誤的思想基础之一，让·布魯姆在1960年10月13日《紅旗报》发表的，题目叫作《比利时与剛果利益相同》的文章中曾經予以揭示：

“和平共处是世界生活和人类发展的現代化观点。

“工人階級及其思想家們寻求了并发现了一种真正文明的形式来解决冲突，一种改造社会与改造世界的新的、真正人民的、民主的方法——和平共处”。

我們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种錯誤的观点，就是把列宁主义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間的和平共处原則搬来解决資本主义世界現有的冲突**，特别是——这是文章的目的——搬到被压迫的殖民地人民的解放的問題上来。我們不能把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間的和平共处同資本主义社会中**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間、資方同劳方之間、帝国主义同殖民地人民之間**的对抗性的、不可調和的冲突的斗争混淆起来。也同样不要把它同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混淆起来。这种可能性在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中得到完善的分析和論断：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队——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力图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在目前条件下，在一些資本主义国家里，对工人階級及其同盟者來說，不經過內战而取得政权和創造和平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声明接着說，“在剝削階級对人民使用暴力的条件下，就必须考虑另外一种可能，即非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样，階級斗争的剧烈程度和所采取的形式，与其說是决定于无产階級，不如說是决定于反动集团对絕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抵抗到什

么程度，决定于在爭取社会主义斗争的这一或那一阶段上这些集团是不是采取暴力”。

关于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民族解放问题，声明说：“殖民地各国人民根据本国的具体条件，通过武装斗争或者非战争的方式争取自己的独立”。

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但是，这种和平共处本身并不包括阶级斗争的一切形式。没有其他形式的斗争，资本主义将永远不会被推翻。

“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出现着有助于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开展阶级斗争、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可能性。同时，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成就又促进和平共处的巩固”。

这就是各种斗争形式之间的生动的、辩证的关系。

战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

帝国主义为整个人类制造了最大的危险。作为战争牺牲者的各国人民要求和平。

社会主义就是和平。

革命是要由各国人民自己来进行的；革命不能输出。但是，共产党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反革命输出。帝国主义输出反革命的企图是对和平最严重的危险。

和平共处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我们为制止一场世界战争、确保对立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和平共处的斗争同我们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在属于我們的这个时代、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目标，现在是、以后仍然是**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范围的胜利**。

社会主义阵营的加强，资本主义世界工人运动的发展，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成就，世界和平力量的加强丝毫不能导致放棄这个战略目标。相反，这些成就創造着更有利于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条件。

在这个意义上說，我們为爭取社会制度对立的國家之間的和平共处的斗争是作为一个策略目标。

一旦达到这个策略目标，那么，保证将它維持到战略的胜利，即社会主义的远景，对这种估計不会产生任何变化。

承认这个事实絲毫不会貶低我們給予这个目标的、首先給予为防止一次新的世界战争——这是我們当前的首要任务——的斗争的决定性的意义。

策略这个字眼，只是在资产阶级或社会民主党政客的头脑中，才具有恶意，这些政客把这个字眼理解为旨在欺騙的、恶毒的阴谋；对共产党人來說，策略目标是严肃的政治目标，是总的斗争和战略斗争中的一部分。

讓我們重复一下：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目标现在是，以后仍然是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很明显，反对这种观点，就意味着**放棄**我們的战略目标——社会主义，而以不同社会制度國家之間的和平共处的目标取而代之。

我們爭取和平、爭取社会制度对立的國家之間的和平共处的斗争不能同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混为一談。尽管小资产阶级在某种情况下是我們在这个斗争中的同盟軍。

和平与和平共处

目前世界上，爭取和平与社会制度对立的國家之間的和平共处的斗争达到了什么程度呢？

赫魯曉夫同志在二十二大上說：“和平与和平共处不完全是同一回事。和平共处不是單純的沒有战争，也不是两次战争之間的暫時的、不稳定的休战；而是建立在相互放棄使用战争作为解决國家之間的爭端的手段的基礎上的两种对立的社會制度之間的共处。”

然而，現在我們不是处在一个沒有战争，沒有武器的世界。

这就是說，爭取和平、尤其是爭取和平共处的斗争還沒有贏得胜利，即使是暫時性的也沒有，永久性的更沒有。

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古巴、南越、老撾、台灣、南朝鮮、柏林、多米尼加共和国——就只提这些地方，都是帝国主义显示其侵略面目的地方。

美国的軍費預算正在不断增长，占总預算的 74%。（其中包括对外軍事援助，“空間研究”，由于軍事开支而造成的公共債務的偿还以及軍事補貼。）

肯尼迪答应到 1964 年底将以北极星導彈装备的原子潛艇的数目增加 50%，将停在跑道上的和准备飞行的战略轰炸机的数目增加 50%，将“民兵”導彈数目增加 100%。他增加地面部队的力量，把枪枝生产从每月九千提到四万四千，将用于打击被压迫國家的游击队的武装力量增加 150%。美国在国外有駐軍一百余万人，在七十个国家中有二百五十个基地。

美帝国主义——主要的侵略和战争力量——要求它所有的同盟者，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东南亚条約組織，加强侵略准备。

重新武装西德和允許西德国防軍在外国建立基地，其中包括比利时，所呈現出来的危險已是尽人皆知，无须再加叙述。

所以，我不能同意下面这样的估計：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仍然是世界冲突的經常危險，但是，再也不会有人相信它是在軍事上战胜社会主义的工具。那么，为什么它还存在下去呢？”

“为什么呢？因为只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威胁性存在的本身，它的冒險和恐吓政策就是对各国劳动人民，例如我国劳动人民——施加政治压力的最好的手段。惧怕战争对反动派、对資產階級有利。这点从工資和就业的情况中，从选举的結果中就可以看出来”。（1960年10月14日《紅旗报》——让·布魯姆）

因而，冷战首先被說成是資產階級在它反对工人階級，反对民主斗争中的一种政治阴谋。誠然，帝国主义准备战争，同增加在国内的反动的，甚至法西斯化的压力，相輔相成。但是，这不应该掩飾問題的另外一面，即战争**实际**危險的存在，帝国主义**确实**在准备战争；不应该掩飾，我們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号召斗争，号召行动起来，反对这些危險。

我們对帝国主义者及其代理人行动的反击，不能是鸵鳥政策。我們应该这样地行动，使得一方面不否认或低估战争危險的存在，另一方面，不把人們引向恐惧的地步，以致产生消极被动。

我也不能同意让·特尔夫同志在1962年1月15日的《紅旗报》上所作的分析：

他在分析这样一次可怖的毁灭性战争时說：“在过去历次战争和一次可能爆发的热核战争之間存在着质的不同”。

然后又說：“战争是取得胜利和夺取霸权的手段。在一場热核战争的条件下，这种手段是否仍然成为一种手段？……”

“結果的不可知性，和所冒着的巨大的危險性，很自然地取